西汉礼制器物的美学体系与精神意涵研究

姚祎潼

长春人文学院，吉林长春，130117；

摘要：西汉王朝是中国大一统帝国文化格局奠基的关键时期，其美学思想深植于政治制度、哲学思潮与社会结构。礼制器物（玉器、青铜器、漆器等）作为最具代表性的物质载体，在继承先秦“制器尚象”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儒家伦理秩序、黄老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及楚地的浪漫旧风，构建了“器—纹—道”三位一体的美学体系，具备国家礼制象征、权力话语媒介与宇宙观图式的三重美学功能。西汉礼制器物这一美学体系塑造了王朝庄重雄浑、寓巧于拙的时代风格，也深刻体现了在“天人感应”宇宙观下，帝国通过礼制器物映射政治理想，实现文化整合。

关键词：西汉美学；礼制器物；纹饰象征；天人感应；儒家礼制

DOI：10.64216/3080-1516.25.08.027

在当下，进行西汉美学研究的核心困境在于文献记载的零散性与理论表述的隐晦性。当文字史料不足以构建完整的美学图景时，承载着时代精神的物质遗存、与国家礼制紧密相关的器物，便成为破译西汉美学密码的关键载体。以金缕玉衣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提供了弥补文献空缺的实证基础。

礼制器物的形式表现绝非单纯的工艺杰作，而是帝国意识形态的物质化表达。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表象下，西汉思想实为儒、道、法、阴阳家的融合体。董仲舒构建的“天人感应”宇宙观成为国家哲学，深刻地影响了器物的创造与使用。《礼记·乐记》云：“制度文章，礼之器也”，明确指出器物是礼制的外显形式。本文即从“器以藏礼，纹以载道”的核心理念出发，通过物态及意义分析，揭示西汉礼制器物如何构建起一套服务于大一统帝国的美学体系。

1 礼制器物的形制风格：大一统秩序的物质表现

礼制器物的形制是帝国意志与时代精神的直观投射。在西汉时期，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庄重雄浑与寓巧于拙的统一。在这些礼制器物中，尤以玉器、青铜器和漆器的制作与使用最为广泛。

1.1 玉器

在西汉时期，玉的使用一是对“君子比德于玉”的儒家理念的极致演绎，二是其主人身份地位的至高象征，极具代表性的有金缕玉衣和玉璧。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金缕玉衣，其以 2498 块岫岩玉片连缀而成，覆盖全身。玉衣形制规整方正，玉片切割严谨，金丝编织细密，整体呈现出肃穆威严的视觉感受（罗泽原等，2022）。大型玉璧体量空前，廓形饱满，虽舍弃了战国玉璧的繁复镂空，却能在平整光洁的璧面上以“游丝毛雕”刻画出流转的纹饰，显示出“寓巧于拙”的典范。此外，玉圭等礼器的形制也趋于规范化，尺寸比例更明确地对应着使用者的身份等级。

1.2 青铜器

汉代青铜器虽在日用领域被漆器部分取代，但在国家大典中，其仍居于核心地位。西汉时期的青铜器形制从商周的“重酒”转向“重食”，鼎、钟、壶成为礼乐重器。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金银鸟篆文铜壶”，形体硕大稳重，颈部收束，腹部圆鼓，圈足外撇，线条刚健流畅。不同于商周的狞厉或战国的纤巧，传递出一种浑厚内敛的力量感。器身通体以金银错的鸟篆文和云气纹为装饰，铭文内容为颂祝之辞（陈雅洁，2022）。但其作为独立艺术表现的功能已弱化，纹饰与造型本身承载了更多象征意义。许多西汉青铜器表面采用了鎏金工艺，在庄重中增添了帝国气象的恢弘。

1.3 漆器

漆器是西汉工艺与艺术融合的巅峰之作。1972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 1 号汉墓出土的云气纹漆棺，棺椁形制方正硕大，黑漆为底，庄严肃穆。其上以朱红、赭石等色描绘的云气纹奔流不息、充满动势。云气纹作为汉代器物常用的装饰纹路之一，线条如行云流水，在刚直的棺体轮廓限制下自由穿梭，形成强烈的视觉张力。同墓出

土的“君幸食”漆耳杯，造型轻盈实用，杯口及双耳镶有精致的银釦，杯身内外髹黑红二色漆，内底以朱漆书写“君幸食”三字，外壁则绘有飘逸的卷云纹和几何纹。在实用器皿上施以华丽装饰的做法，实则是礼制向日常生活空间渗透的一种表现。

综上所述，这些器物共同体现了西汉的时代风格：在体量感、简洁性和力量感中寻求秩序，又在精微处展现卓越技艺与灵动想象，最终服务于“昭明等威”的礼制要求。材质本身也构成等级符号：玉象征最高等级与道德纯净、青铜则承载着历史赋予的礼器属性、耗费百工之力的漆器，则成为新兴贵族阶层彰显财富与地位的新宠。

2 纹饰系统：宇宙图式与精神信仰的视觉符码

礼制器物的纹样并非简单装饰，而是一套高度系统化、承载着宇宙观、伦理秩序的视觉符码系统。其核心母题及其象征意涵构成了理解西汉美学精神的关键。

2.1 云气纹：宇宙元气的视觉交响

作为西汉最具标志性的纹样，云气纹的形态源于楚文化的浪漫风格，在西汉被赋予了新的宇宙论内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构建了以“气”为基质的宇宙观，“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云气纹正是这种“元气”流动的视觉化呈现。纹样以流畅婉的线条构成，或舒卷升腾，或回旋聚散，充满动势与韵律（详见图 1 马王堆一号汉墓黑地彩绘漆棺云气纹）。它常作为主纹的骨架或背景，串联起画面中的其他元素，营造出周流不息的宇宙氛围，是“气韵生动”这一重要美学范畴的早期形态。云气纹在沟通天地、营造升仙氛围等方面具有核心作用。

图 1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黑地彩绘漆棺

2.2 四神纹：时空秩序的方位守护者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神兽纹样，是阴阳五行学说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完美图像化表达。它们分别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以及春、秋、夏、冬四个季节，并与青、白、红、黑四色以及木、金、火、水四种元素相对。在瓦当（如图 2 四神瓦当）、铜镜镜缘与画像石上广泛出现。其构图往往遵循严格的对称与均衡法则，如瓦当上四神分据四方体现了儒家“中正”思想与宇宙和谐观。四神不仅是方位标识，更是守护四方、维系宇宙时空秩序稳定的神圣力量。

图 2 陕西历史博物院馆藏 西汉四神瓦当

2.3 瑞兽灵禽：祥瑞思想与升仙愿景的载体

螭龙、凤鸟等充满想象力的瑞兽灵禽纹样，大量出现在玉器、漆器、织物和画像艺术中。它们承载着多重意涵，如受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影响之后出现的祥瑞思想，祥瑞被视为上天对君主德政的嘉许和国家祥和的预兆；其次是融合了楚地巫风与方士神仙学说的升仙长生观念，瑞兽灵禽的形象寄托了贵族阶层对飞升仙境、获得永生的强烈渴望（如图 3：马王堆 T 型帛画顶部的金乌与玉蟾等）。这些纹样在形式上往往姿态矫健，充满动感，线条奔放流畅，保留了楚艺术的浪漫主义基因，但整体服务于现世帝国的福祉追求和统治阶层的终极关怀。

图 3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T 型帛画

2.4 几何纹样：秩序与稳固的基石

菱形纹、柿蒂纹、博局纹等几何纹样常作为主纹的骨架、边饰或地纹出现。它们虽然相对抽象，但同样承载着象征意义。如博局纹源于六博棋盘，在铜镜上被高度符号化，被认为象征宇宙格局或时空的框架；四瓣或八瓣的柿蒂纹可能象征“四方”或“八极”；连续的菱形或方格纹则代表稳固和秩序。它们为充满动感的云气、瑞兽提供结构支撑，形成“满密而不壅塞”的视觉效果，体现了整体和谐的美学追求（叶晓洁，2023）。

西汉纹饰布局常追求“满”、“动”、“序”的统一。“满”体现在纹饰常布满器表，反映了对宇宙充盈、生命繁盛的想象。“动”表现为云气的流转、瑞兽的奔腾，充满生机勃勃的韵律感。“序”则通过均衡的构图、几何骨架的运用得以保证，使繁复的纹样在视觉上杂而不乱，秩序井然。这种独特的视觉语言，既是多元思想融合的产物，也是“大汉气象”在艺术形式上的直接流露——雄浑博大中蕴含着灵动飞扬的力量。

3“器—纹—道”三位一体：美学体系的精神内核与政治功能

西汉礼制器物美学绝非形式与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器”、“纹”、“道”三者的深度咬合，构建起一个服务于帝国统治与文化整合的系统。

3.1“器以藏礼”：儒家伦理秩序的物质化实践

器物的形制、材质、数量、组合、使用场合，被严格纳入儒家礼制的规范体系，成为区分尊卑贵贱、维系社会等级秩序的视觉化、触觉化标志。《周礼》、《礼记》中关于器物使用的繁复规定，在西汉得到继承和强化。玉器的种类与尺寸对应不同等级身份和礼仪场合。满城汉墓刘胜金缕玉衣的奢华，大云山江都王陵一号墓编钟的规模，都是其生前地位的终极宣示。漆器上的金银釦饰、彩绘的精美程度，也明确标识着使用者的阶层。这种通过器物“昭名分，辨等威”的做法，正是儒家“礼者，天地之序也”思想最直观的物质体现（罗剑鸿，2020）。

3.2“纹以载道”：天人宇宙观的图式化呈现

器物表面的纹饰系统，是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宏大叙事的微观图解。礼制器物本身，尤其是玉璧、博山炉等，常被视为沟通天地的“法物”或“道具”。圆形的玉璧象征天穹，是祭天的核心礼器，璧身上的谷纹、蒲纹象征滋养万物，云气纹、龙凤纹则直接描绘天地元气的流动与沟通。满城汉墓出土的大型玉璧，其纹饰即是对宇宙生机的礼赞。博山炉的炉盖常塑造为层峦叠嶂的“博山”仙境（如图 4：西汉错金博山炉），焚香时烟气缭绕如海上仙山云雾，这不仅是求仙的寄托，更是通过“烟”（气）这一媒介，实现“地”（炉体）“人”（使用者）“天”（仙山）的沟通，完美诠释了“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的理念。

从整体象征体系进行分析，云气纹是宇宙元气的表征，四神纹是时空秩序的守护者，瑞兽是祥瑞与升仙愿望的载体。纹饰的构图本身是对宇宙结构的模拟。器物通过其纹饰，将抽象的哲学观念转化为可感可观的视觉图式，使使用者在日常礼仪中时刻感知并确认自身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与天道的联系。

3.3“物以昭权”：帝国权力话语的建构与传播

西汉礼制器物美学体系是国家权力运作的重要媒介，体现在多个方面。国家控制着玉料产地、铜矿资源以及顶尖的玉作、青铜铸造、漆器作坊，体现了大一统环境下政府对资源与技术的垄断，高端礼器的制造权掌握在中央，是皇权控制力的体现。其次，皇帝将玉璧等器物赏赐给诸侯王、功臣和归附的异邦首领，器物成为皇权恩典、臣属关系和政治忠诚的物质见证，是帝国权力网络延伸的具象化。四神、云气等核心纹样，通过官方生产和赏赐行为，形成了一套相对标准化的视觉符号系统。它们在帝国疆域内反复出现，成为传播统一帝国意识形态、强化文化认同的有效工具。使人在使用或观看这些具有共同符号的器物时，无形中接受并内化了其所承载的宇宙观、等级观和帝国权威。

3.4“楚风汉韵”：多元文化的熔铸与升华

西汉美学并非单一源头的产物，而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晶，其礼制器物可见先秦文化的传承和影响。如诸多青铜器在器物形制的规整、体量的宏大、礼制规范的继承均体现了先秦的厚重秩序感。西汉礼器上的云气纹的流动飘逸、瑞兽的灵动奇幻、漆器色彩的浓郁对比及线条的飞扬恣肆，都深深烙印着楚艺术的精髓（袁梦秋，2015）。马王堆汉墓的漆器与帛画更是楚风汉韵的完美代表。西汉礼器的部分动物纹饰具备写实性和动态张

力，可能吸收了草原艺术元素。如茂陵石雕中的“跃马”、“卧象”等塑像，雕刻手法古拙粗犷，明显带有北方匈奴文化的特征。

西汉艺术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将不同的文化元素熔铸于大一统帝国的宏大框架下。以儒家礼制为筋骨，以“天人感应”为灵魂，以楚地浪漫为气韵，最终形成其雄浑博大、深沉内敛又不失灵动飞扬的强汉气象。这种气象既体现在汉大赋的巨丽，也凝聚在一件玉璧、一尊铜鼎、一幅帛画之中。

4 礼制器物美学的范式意义与历史回响

西汉礼制器物所构建的“器—纹—道”三位一体美学体系，是中华礼乐文明在帝国初兴时期的物质性高峰与精神性结晶，是承载着深刻文化意涵与政治功能的综合性美学范式。这一范式的核心在于以“器”为物质根基和礼制载体，以“纹”为视觉语言和象征符码，共同指向和服务于“道”——即大一统帝国的宇宙观、伦理秩序和政治理想。在这个体系中，器物及纹饰最终都超越了感官愉悦的层面，升华为对宇宙秩序的认同、对社会和谐的追求、对帝国权威的尊崇以及对生命永恒的向往。其庄重雄浑、寓巧于拙的整体风格，正是一个大一统帝国自信、气魄与包容力的艺术外显。

西汉礼制器物美学的范式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广泛。其奠定了后世礼器美学的基调，东汉的礼器、魏晋的宗教法器，在形制、纹饰象征和礼制功能上都可见汉代美学范式的延续与发展。这一美学范式还塑造了后世的设计哲学，西汉的“制器尚象”、“器以载道”等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工艺美术、建筑、园林的设计思维，强调形式与功能、装饰与内涵的统一。西汉礼制器物美学对“大美”（雄浑、整体性）与“秩序”（和谐、等级）的追求，成为贯穿中华美学史的重要传统。对“气韵”的重视，也在后世书画理论中发扬光大。

5 结语

研究西汉礼制器物美学，其意义一在解读古代物质文化的辉煌，二在理解中华文明如何通过具体的物象构建宇宙认知框架、伦理价值系统和社会政治秩序。它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东方智慧：将最形而上的精神追求（“道”），落实于最形而下的物质载体（“器”）与视觉形式（“纹”）之中，通过器物方圆、纹饰流转、材质品阶的呈现，完成人们对宇宙人生的体悟与安顿。这种“道在器中”的思维模式，构成了中华美学精神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也是一个历史时代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美学遗产（虎巾琦，2022）。

参考文献

[1]罗泽原,朱先梅,李安妮.两汉时期丧葬玉衣及其美学特征——以满城汉墓金缕玉衣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2(14):42-44.

[2]陈雅洁.满城汉墓鸟篆文壶铭文整理及构形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2.DOI:10.27159/d.cnki.ghzsu.2022.000471.

[3]叶晓洁.汉代镜铭文字在印章中的应用[D].中国艺术研究院:2023.DOI:10.27653/d.cnki.gzysy.2023.000128.

[4]罗剑鸿.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编钟造型的美学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13):26-27.

[5]袁梦秋.论西汉云气纹的风格特征与荆楚美学之关系[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5,2(03):111-113. DOI:10.16824/j.cnki.issn10082832.2015.03.028.

[6]虎巾琦.西汉透光镜纹样的美学意蕴与现代应用[J].美术教育研究,2022(14):39-41.

作者简介：姚祎潼（2005—），女，汉族，广东潮州人，在读本科生，长春人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